

# 晴雪堂随笔



# 第一辑 落花无言

只有在梦里才能回到我童年的故乡：营盘地一望无际的碧绿，顺安山四季变幻的风景；茅芽坡上火红的高粱，黄家畈丰收的稻香……而最使我流连的还是村边的古柳、故乡的水井和遍野的花草。“落花无言”，却在我记忆深处留下一道道亮丽的风景。



## 故 乡 的 井

“筛娃儿大一块菜，紧吃吃不败。”这是故乡妇孺皆知的一则谜语，也是故乡水井的生动写照。

故乡的井水曾映照过我童年的身影，滋养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乡民。

四五十年前我们邻村麒麟店东头，靠近公路旁的一口老井，井台上常年放着连着井绳的木制小水槽，供路人临渴之用。那是一口砖井，据说有千年的历史，井内墨绿色的青苔把砖缝全部遮裹，向下望去深不可测。上小学时，与同学们在井上打水、嬉戏，见过往的行人井上洗、饮就像在自己家里。麒麟店是横贯鄂西南千年故道上的咽喉，司马徽、刘皇叔、诸葛亮等当年曾到此取用井水亦未可知。我甚至猜想它是否与襄阳古城西街有着 2000 多年历史的“小井”相关联……

故乡的石井相对就“年轻”一些，以石块垒砌，既利于井水循环又有利于对水中杂质的吸附。营盘地襄南公路北侧的“王家水井”，人们即可沿着井壁石头的缝隙踩下两三步，用手捧着水喝。在交通还不发达的时代，那口水井曾为无数过往的行人提供过方便。

故乡的水井，大都凿设在村落的中央。原来我们的祖先以井为中心而集居，《易·井》曰：“改邑不改井……”村落可能搬迁，而井却不会变动。古代因井设市，遂有后来的“市井”之谓，相传古制八家

为一井,后引申为乡里、人口聚居地。《孟子》中说的更为具体,古时的井田法,方一里的田,划分成井字形的9等份,四周的8份为私田,中间是公地及宅地,并掘井共用。“井”字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已频繁出现,两周金文中“井”字中间又加上一点,寓意打水的吊桶。亦见古人对井的描摹。

我们村曾有两口水井。一口砖井,连我的祖辈们也说不清打井的年代,口径不足三尺却有四五丈深,井水循环不快,水位低,打水吃力,20世纪50年代末就渐渐废弃了。另一口井,石块垒砌,两三丈深,口径大、井台宽敞,无论干旱多久都能满足全村200多人的日常用水。

我们村的水井,既无井栏又没装轱辘,两条小路通往井台,路的两旁都是大片连绵的荷塘,还要过一座石板桥,遇上雨天道路泥泞,挑水是很吃力的。上中学时,偶尔雨雪天挑水,只挑两个半桶,趑趄趑趄,印象极为深刻。

70年代初,“襄轴”落户村后,村里近水楼台用上了自来水。可从南到北一两里长三四十户人家的村庄,仅装了一处简易的自来水管,自然是供不应求。许多村民仍然习惯于井上挑水,可自来水毕竟方便、卫生,又是免费供应,人们与井渐渐拉开了距离。

70年代中后期,电力紧张。停电、停水习以为常,村民们还是离不开世代相依为命的水井。特别是夏季一旦停水,工人们也不得不走出家门,成群结队挑着、拎着大大小小的水桶,到村里的井上取水,井水便会告急。但井水毕竟不要成本,一夜之间又会回到平时的水位。《易》曰:“井,养而不穷也。”古今一理,井,平凡而神奇。

井,在民间是神圣的。旧时代,“跳河投井”曾是一种自我了结的方式。可在我熟悉的、十里八村自寻绝路的村民中,没有一例是选择投井的。无论多么作恶的歹人,无论多么捣蛋、恶作剧的小儿,

都不会、不敢将污秽物抛入井中。井,独立于野外,无人守护,却始终保持着它的圣洁和尊严。

偶尔读到杜甫“儿童汲井华,惯捷瓶在手”的诗句,就联想到小时候盛夏在井边玩耍,常用线绳吊着中间穿着扫帚芊儿、掏空了的半截菜瓜,在井里“打水”,欣赏着轻轻溅起的水花。后来才知道,古时称清晨打起的第一桶水为“井花”。“旋汲井花浇睡眼,洒将荷叶看跳珠”,多么美妙地意境。

故乡的井水冬暖夏凉。三伏天,喝上一碗刚刚打起的井水,会比时下的什么“可乐”、“鲜橙”之类消暑解乏。五六十年代,政府重视农村饮用水的卫生,定期在井中投放“消毒包”,很长时间人们才慢慢习惯带有“漂白粉”味道的井水。而一些偏远的乡下井却是很简陋的。70年代中期我曾拉练到麻城、红安一带,那里不少地方的农民还是在稻田边的土井里取水食用,井像一个小水坑,周围长满了蒿草,料想水质不会太好,不知现在是否改善。

“井里哈蟆、酱里蛆”是家乡的一句俗语。而“淘井”却是乡民们定期净化水源的传统手段,当然,也是我们儿时爱看的热闹。

淘井是有讲究的。污秽物或者人、畜不慎落入井中,必须立即淘井;再就是每年一次的例行淘井。

俗话说“寸土难移”,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。那时全靠人力,要将井水淘干,谈何容易。七八个劳力、四五只水桶,快马加鞭,从吃过晌饭到日头偏西,终于淘到井底了。井口上架一根圆木,用缆绳将人系到井底。若在夏天,下井人还要穿上棉衣。他将井壁上的积淀物冲刷干净,最后淘出的便是一大堆淤泥。围观了半天,就是期待着能淘出点儿什么稀罕之物,而每次大约都是瓦罐、搪瓷缸或一两支塞满泥沙的钢笔,我们也只好扫兴而归。

上中学后,再也没机会遇上过淘井了。偶尔听说附近的工人有手表、眼镜之类坠落井中,还听说用线绳系着“吸铁石”之类进行过

打捞。井,一定给那些不慎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故乡的水井,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功成而弗居……而饮水思源,像乳母一样世代代滋养着我们的井水,却永远流淌在我们记忆的长河里。

2005年5月于晴雪堂

## 家乡的童谣

“桃花儿开,杏花儿落,枣子开花儿吃馍馍。”这是50年前家乡曾经流行的童谣,至今犹在耳畔萦回。

我的家乡——襄阳古城西门外的古营盘,40多年前,是名副其实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。我的祖辈、父辈们虽然几乎都是老实巴交、目不识丁的农民,可他们传承着好多好多的故事、笑话和童谣。我的幼年,就是伴随着一曲曲通俗有趣的童谣度过的。你听:“板凳娃儿——,歪——歪,我是奶奶乖——乖,奶奶不给饭吃,拣个枸杞蛋子;奶奶不给水喝,扎到井里紧喝……”

家乡的童谣虽然零散,却有着年龄的适应性。呀呀学语,就只能让老人教唱:“扯——锯,拉——锯,接干妈,看——戏;干妈来——了,谢了台了,干妈走——了,戏又来了。”稍大,便能随着大人和唱:“背背驮——换酒喝,酒冷了——我不喝,还要我的背背驮。”那时,带着三四岁的小儿出门,不是放在箩筐里挑着,就背着。儿时我就曾让大人背着到远在檀溪的乡政府开会或看戏,背累了就骑在大人的脖子上“打丫脖子”。小儿哭闹,打个“丫脖子”转上一圈,就是最大的赏赐。“豌豆角儿,弯弯儿的,单单儿要吃张三儿的……”“皂角树,高又高,上面结了万把刀……”四五岁时,便能一字一板儿的高歌了。这类童谣形象生动、语言精练,节奏明快、朗朗上口。



季节的适应性,是家乡童谣的一大特色。“桃花儿开,杏花儿落,枣子开花儿吃馍馍……”不仅形象、准确的寓示节气的更替,更蕴含着深深的期盼。阳春三月,桃花初绽、杏花凋落,枣树开花的时节就要麦收了;转眼新麦上场,就可吃上新面的馍馍了。

20世纪50年代的乡下,要想在过年之后、麦收之前,吃到一顿馍馍是非常不易的。偶得一块烙饼,放的干硬如铁,还视若珍馐。那时,我婶娘家有两棵枣树,那棵很大的枣树下有一盘碾子,每年枣花儿含苞待放之际,我们天天都会爬上碾盘,注视着枣枝上小米粒般大小、嫩绿色的花苞;仿佛枣花里就能幻化出“泡乎乎”的馍馍。

家乡的童谣,充溢着泥土的芳香,信手拈来,透视出家乡的风土人情。

“哇——哇;哇,哇;……”夕阳西下,村后的枯树上传来了乌鸦的叫声。躲在各个角落的小儿都会触景生情,奔涌而出,不约而同的向着“哇”声:“老鹅‘哇——’,肚子饿,今天没有我的祸;老鹅‘啊’,肚子饿……”和者越来越多,节奏越来越快,简直就是童声号子,高亢激越,驱散了老鹅的聒噪;祈示着山村的平安。

春天来了,绿油油的麦苗在春风中碧波荡漾,大雁开始北归了。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儿们,涌向村口的田边,仰望天空一会儿排成“人”字,一会儿排成“一”字的雁阵:“雁儿——雁儿,扯长线儿,扯不长——失了娘,扯不花——失了妈。雁儿、雁儿……”稚嫩、欢快的歌声,随着飞雁阵阵绵长的鸣叫飘向原野,飘向远空。

麦浪滚滚,开镰在即,大人们开始平整稻场,准备收割了。晚霞满天,炊烟缭绕,孩子们从村子的南、北两头,欢呼雀跃地拥向洒过麦糠、刚刚用石碾轧好的新稻场上:“小麦青,大麦黄,油菜花儿落轧稻场;小麦青,大麦黄……”打着赤脚,四五个围坐成一圈:“金金脚儿,银银脚儿,菜花儿落,摆筐箩;筐箩南,筐箩北,南北堰上种荞麦……”清脆欢畅的童谣声在稻场上空此起彼伏,暮色中的乡村沉

浸在丰收在望的欢悦之中。

自古，平民百姓常借童谣形式讽喻现实，表达思想情感和愿望，带有丰富的幻想和浓郁的时代气息。

“月亮婆婆打算盘，舅舅来了做啥饭？小锅里打鸡蛋，大锅里做干饭，舅舅吃了陪我玩。”“棠梨子树，糖又糖，棠梨子树下盖瓦房，三间瓦房没盖起，城里大姐来送礼……”清晰地折射出当时农民的生存状态。

家乡的童谣，盛行于五六十年代。70年代后，独生子女的户外活动日渐减少；分田到户，大稻场被瓜分，孩儿们失去了群聚嬉戏的场所。五六十年代乡村那种一二十个小儿集聚一起，整天在偌大的稻场上摸爬滚打、吆喝嬉戏的欢乐场景一去不复返了。

李贽《焚书童心说》：“夫童心者，绝假纯真，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”幼时家贫，却有丰富的精神食粮滋养着我们。可惜，时过境迁，家乡那些曾作为我们启蒙教材、伴随着我们欢乐时光的童谣，也像当年北归的大雁渐渐地远去了。

2004年5月于晴雪堂

## 雪花飘飘

小时候,讨厌雨天却欢喜下雪。

“下雨一团糟,晴天万把刀”是黄土地乡下的写照。雨后的黄泥路,泥泞难行,遇上连阴雨,村口路上的胶泥漫过鞋口,穿着“马鞍儿”的胶鞋根本无法行走,只好打赤脚,弄不好摔一跤,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。

下雪就不同了,北风吹来,雪花飘飘,“四野苍茫际,千山晃朗中”,整个山村笼罩在朦胧的世界里。家乡的雪如粉如絮,即使穿着布鞋我们也能满地疯跑,像雪花一样随处飘落。傍晚,山村寂静,门前柴堆上窸窸窣窣的落雪声依稀可辨,仿佛柴草也欢迎一床厚厚的棉被;远处天地相连,惟余莽莽。天黑后,偶见某家开门看雪,灯火闪亮,眼前便会出现一条奇妙的“隧道”。

人们常说,“沾了十月节,刮风就是雪。”入冬之后,北风一起,天变得灰蒙蒙的,大人们开始忙碌着打扫院子、储备柴草,我们知道就要下雪了。果然,傍晚就下起了小小的雪粒儿,或飘起了碎碎的雪花儿,由小到大、由疏到密,待到掌灯时分,已经是纷纷扬扬的大雪了。大门外白茫茫雪花遣霰,房顶上雪皑皑一片光亮;真个是“江山不夜月千里,天地无私玉万家”。

屋外雪花飘飘,万籁俱寂;屋内,我铺着厚厚稻草的小床上却多了几分暖意,我酣然梦到与我家的黄狗在雪地里奔跑、嬉戏……

清晨开门,田野、远山银装素裹,门前、村口玉树琼花;门槛、门磴尽被瑞雪覆盖。家家门前的麦秸堆,如同一个个堆满了奶油的巨大蛋糕;玉雕般的屋顶,把灰黄色的土墙衬托的更加苍茫、斑驳。山村仿佛就成了人间仙境,又仿佛回到了远古的村落。要说“赏雨茅屋”是一种典雅意境,那么,“茅屋品雪”可谓是清奇境界了。

门前的雪地上,数行较大的、梅花形的足迹,虽被新雪覆盖,却仍然依稀可辨,偶尔见到一两处灰白色的粪便,我们就敢断定这里一定有狼“光顾”,甚至还可以依迹寻觅到狼的“来路”。人们还未来得及铲去门前的积雪,躲到篱笆边、柴堆下的鸡群,已在上面积出了重重叠叠的“竹叶”。北风微微,雪花飘飘,小院里静谧中萌动生机。

小伙伴们常将五指撮拢,比赛似的在篱边雪地上模仿出一串串狗的足迹;也会用雪捏弹丸相互攻击;还会被毛头小伙子“骗”到冬青树下,猛踹一脚,碎玉迸溅、灌入脖颈,男孩狂喜、女孩儿尖叫,笑骂声里一场追打的嬉戏。

儿时常听老人们讲,很久很久以前,天上本来下的都是面粉,可人们越来越懒惰,竟至将烙好的大饼挂在脖子上躺着吃,上天震怒了,就化面为雪。所以,小时候对雪总有一种敬畏,特别是门前篱笆上那些奇妙、纯净的雪景,总不忍它染上污迹。

上学时,学校与家分别在“营盘地”的东西两端,每遇大雪,空旷的“营盘地”就像一片银色的海洋。三五少年忽散忽聚,恍如海面的鸥鸟,海阔天空、若隐若现。茫茫无际的豆、麦地里,鸟雀的脚印、野兔的足迹时续时断、交错迷离,那真是童话般的世界。每次顶着风雪回到家时,总要站在院子里,母亲一边用刷帚扫去身上的积雪,一边埋怨在雪地里玩得太久。

稍大,在襄城西门外上学,出村儿便是一片旷野,其间还要走过一段高高的“南堤”。隆冬时节,瑞雪纷飞,天地相连,既没有雨

伞,又不能戴斗笠,女孩头上系一条方巾;而我们却戴着像电影《南征北战》里解放军的帽子。路上,我们会根据风向,或侧身垫步奔跑,或倒退着碎步小跑;一路滚打追撵,见到平展的雪地,展开四肢直挺挺地扑下去,一个四肢伸展的“雪人”怡然印在大地。

迎春的飞雪更加亲切。伙伴们时常聚集在村口的库棚里,欣赏那旷野不断变幻的风景:一会儿是鹅毛大雪漫天狂舞,我们也好像要乘风飞起;一会儿北风稍停,雪花又似柳絮般缓缓飘散,村口前新年扎制的“彩门”依然披红挂绿……荷塘里起伏不平的雪地上,枝枝杈杈的残荷,就像稚童在素纸上的涂鸦,参差错落,清新自然。雪堆积的越厚,残荷就越发萧瑟、稀疏,塘中的残荷、塘边的枯树显得更加劲挺、倔强蕴藏生机。飞雪就像一枝神奇的画笔,不断地收拾着画面,一条黄狗悠然地走过,为山村平添几分神秘。和着新年的鞭炮声,偶尔还会出现奇妙的幻觉,荷塘中竟生出几枝嫩绿。

雪花飘飘,为我童年带来无限欣喜,却也曾带给我困苦。1965年冬季一场大雪,我住读在学校里,没有备用的鞋子,脚被冻伤,多亏了黄校医为我疗治,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即便如此,我对雪仍然一往情深,每至隆冬,总是期盼着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瑞雪兆示丰年;眼前总会幻化出雪花飘飘时,在村口前、篱笆边弄雪的情景。

2008年12月

## 油灯下的记忆

油灯,家乡简称为“亮”。“天黑了,快把亮点燃”,这是母亲或父亲的声音,我的童年几乎每天都是在油灯的照耀下进入梦乡的。

记忆最深的是童年时床头的那盏油灯。确切地说那是一个灯盏,一个十分粗糙、深灰色陶制的灯盏;一根细细的棉线捻子躺在灯盏内的油中,一端伸向灯盏微凸出的沿口,灯火就像一枚枣核,“枣核”就像一个圆心,周围的光线逐渐暗淡。“一颗谷,棚满屋”,家乡这则极为简洁的谜语何等形象。就着这盏油灯,每天天黑后母亲端着它从堂屋忙到厨房,忙完厨房又端着它再进到“房屋”(卧室),我拽着母亲的衣角、随着油灯走动。初冬的夜晚,我时常早早地躺在被窝里,看着母亲用缝衣针把灯火拨到很小之后,便开始忙碌着她永远做不完的针线。我就会眨巴着眼睛,看着时而跳动的灯火或时而发出一点轻轻爆响的“灯花儿”。

古人以“灯花”为吉兆,汉刘歆谓:“夫目矚得酒食,灯火花得钱财。”杜甫也有诗句“灯花何太喜,酒绿正相亲。”幼时无知,自然难以联想到这深刻的含义。后来每当抄录到“江湖派”诗人赵师秀“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”的诗句时,总会联想到儿时静夜中“噼啪”闪跳的灯花儿。

解放初期,家乡的油灯多用植物油,有时救急,在小调羹里面放一截棉线,倒一点菜油,就是一盏简易的油灯。蓖麻收获时节,我

们还用剥去硬壳、白白嫩嫩的蓖麻籽串在一根长长的竹签上,就像一支小小的、白玉般的冰糖葫芦。二三十粒蓖麻籽也能当灯“点”上半个时辰。点亮自己的杰作,心里美滋滋的。

20 世纪 50 年代末,油灯的燃料改用“洋油”(煤油)。洋油是外来之物,既易爆燃又易挥发,灯盏不堪使用,又买不起洋油灯,大哥就用废弃的墨水瓶自制油灯。圆形的铁片中心打孔,把铁皮卷成的小圆筒穿入圆心,穿上捻子、配上瓶子,油灯就成了。这种灯比起灯盏要方便、安全。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,乡下的油灯几乎都是这种的形制。洋油还要到邻村——麒麟店的小卖部里去“打”。一次顶多打半斤,2 毛 6 分钱,我再打点埋伏搭上一支铅笔,代销员也心照不宣,就给 4 两多一点,好在油壶是铁皮的,大人很难看出破绽。

合作社时,集体有了马灯。燃料虽然也是洋油,有了大大的玻璃罩,有了合理的通气、排烟孔,不仅亮度大大加强,还能防雨、防风,较之油灯算是很大的进步了。马灯,为集体夜晚粮食的装运、仓储,夜间的排涝抗旱、抗洪抢险都发挥过重要作用。然而,马灯价格昂贵,家家户户仍然使用油灯。

油灯虽然节俭、方便,却并不十分安全。50 年代末,我们村两户人家失火据说就是油灯闯的祸。那时乡下多住草房,引发火灾如不及时扑救,房屋瞬间化为灰烬,还会殃及四邻。

人民公社初期,农村兴唱戏,这时我认识了汽灯。汽灯,铁质,形如马灯而体大;燃料也是洋油,通过人工对油箱内充气,点燃后由自身的热量把油雾化成蒸气,喷在特制的石棉纱罩(汽灯泡)上,发出耀眼的光亮。两盏汽灯,舞台上如同白昼,而后台的化妆室里演员们化妆、更衣仍然还是油灯,光线虽暗却一丝不苟。

1963 年,村里通电,家家户户装上了电灯。虽然电压低,灯光发红,每家也只装了一只的 15 瓦的灯泡,但毕竟卫生、方便多了。每年春节,在远郊的舅舅家里小住,晚上与表姐妹们在油灯下看书、

嬉戏,开始感到油灯落后了。

70年代电力紧张,三天两头停电,家里还是离不开油灯。我买来一架“罩子灯”,玻璃花瓶似的灯体,螺旋的金属灯头、四支灯爪将玻璃灯罩卡在其中,既可调节明暗,又能消除烟尘。时常停电的日子里,一盏油灯相伴,别有一番风味。

灯,能指明破暗,佛家常用以比喻佛法;灯,又是照明器具的总称,《说文》作“鐙”。不久前,翻阅《收藏》杂志,油灯具还成了时下的收藏品。上海一位叫李银伟的藏家,竟收藏有上自新石器时期,下至近现代的各种油灯具300多件。不仅有我熟悉的马灯,更有我记忆中的“豆灯”。一幅幅图片,把我带回到童年,带到了远古……与油灯相亲相近20多年,我一直欣庆,我曾经使用过我们老祖宗发明并不断改进、延续了几千年的油灯。

2003年12月于惜缘堂



## 母亲的纺车

四五十年过去了,曾伴随着母亲步入老年的纺车,连一块木片也没留下,可母亲纺线的情景却深深的留在记忆里;“呜喻、呜喻……”的纺车声,时常还在梦中萦回。

纺车,是用纺槌摇转缥轮,带动锭子抽纱的纺线工具。

我家曾有过两台纺车。我上学前,伴随着母亲步入中年的第一台纺车,因年久失修而散架;无师自通木活的大哥,便用新料、按老样自制了一台。缥轮,是由两组各4片杉木板交叠成米字形、用线绳交错联结、固定在转轴上的一个整体,像个车轮的骨架。一根水平连杆连接车头、车架,车头上装有两块垂直的、脚板状的锭子支架,支架上卡入石榴树细枝条绾成的“轴套”,将锭子套定。手握纺槌儿,摇动缥轮,“链线”就带动锭子飞速旋转。连不善纺线的大嫂也说:“这车子轻省,好用。”

1999年我国发行一套《汉画像石》邮票,其中第2枚为“纺织”。方寸之中一妇女坐地,操动纺车的情形清晰可辨。元代王桢《农书》载有“木棉纺车图”,较之现代纺车简陋,且还要镇以纺埦以制纺车摇晃。清王应奎《柳南随笔》中也有记载:“余见今世纺车之式,下有木一纵一横,往往以砖镇之……盖防其摇动也……”小小纺车,直到近现代才相对定型,经历了多么漫长的岁月。

每年进入冬季,就是母亲最忙活的季节。白天光线好,忙于针